

日中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

——“共同作业”与走向“和解”的尝试

山田辰雄

日中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一环,也是日中两国之间的战争。先前围绕日中战争的课题,学界已经展开了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影响也往往超出学术领域,引发了基于历史认识分歧的日中政治对立,此种状况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对于这种局面,我们研究者能够做些什么呢?

我本人以前也曾参与过几项与日中战争相关的国际性研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始于2000年的日中战争国际共同研究。这项研究由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美国哈佛大学)、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我共同发起,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夏威夷毛伊岛、箱根、重庆(两次)以及台北召开了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历次会后也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除了日本、美国、中国大陆之外,会议还吸引了英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俄罗斯、韩国、印度、缅甸以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学者的广泛参与。这项计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各国学者汇聚一堂,通过各自掌握的本国独有资料,共同对日中战争中的特定事件或某些局面进行比较研究,以形成相通的历史认识,促进相互理解。

一、“共同作业”的必要性

各国研究者已对日中战争的某些局面及事件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厘清了一些事实,这当然十分可贵。在过去的“共同研究”中,各国研究者依据各自掌握的独有资料,通过学术研讨会及论文等形式展开交流。不过,在我看来,仅仅在共同研究中“厘清事实”,未必就一定能够促进日中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

历史中出现的数字问题比较直观,所以日中双方的媒体往往倾向于聚焦特定事件,进而扩大政治上的对立。政治家们有时会抑制这种倾向,但有时也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其加以利用。往往会成为争论焦点的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人数。在近年来由日中两国官方所推动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报告书中,两国专家对这一问题持慎重态度。

日方的研究者是这样叙述的:“日本军队虐杀致死者,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为20万人以上……而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则判为30万人以上,中方的见解即依据后者数字。但在日方现有的研究中,均以20万为遇难者人数之上限,此外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数字。”与此相对,中方报告书内容如下:“根据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之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周内,南京城内及附近遭到屠杀的平民与俘虏就达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遭到集体屠杀的人数多达19万人以上,此外还有15万人以上被零散地屠杀,遇害者总数为30万人以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中两国研究者在谈及南京事件遇害人数时,都提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两种同样的记录。但中方研究者由此得出了受害者30万人以上的结论,而日方则未提及具体数字。这样的数字在政治性场合被提起,再经媒体宣扬后,双方就会

互相指责对方“错误”的历史认识,进而引发政治上的对立。

包括日中两国在内,世界范围的日中战争研究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可以展开对话的国际性团体。在此情形下,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各国研究者汇聚一堂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相互交换意见的“共同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各国的研究者围坐一起讨论如何才能达成最终结论的“共同作业”。

二、走向“和解”的尝试——南京与广岛

为了达成“和解”,处于对立中的两国国民有必要认识对方的心理并了解其思维逻辑。因此,要将日中两国人民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导向“和解”,就需要大胆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中国领导人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对日本的侵略加以批判时,一部分或者更多的日本人就会把这一行为看作是“反日运动”。然而,不能不理解中国领导人这一行为背后存在着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怨念,以及中国一般民众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批判。甚至也可以认为这种批判源自支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有时会过于顾及人民特定的感情,这能够增强国民的一体感,但也有可能引发反对对方的运动。但是,应该将这样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人民对南京事件的历史认识区别对待。

日本人以及日本政府每年8月都会举行仪式,悼念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遇难者。日本首相会出席这一典礼,并且最近美国驻日大使也前来参加。这并无法抚平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怨念。然而,包括官方人士在内的大多数日本人以及外国人并未将此仪式视为反美运动。既然如此,日本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去访问南京呢?

问题在于日中战争中的“正义”。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日中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现在,日本、美国与中国的人民还无法完全摆脱这一认识框架的束缚。要从这一历史纠结中解放出来还需要时间与努力。为了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日本、美国及中国的领导人有必要互访战争死难者的遇难之地。

这就是我通过参加日中战争共同研究获得的一点感想。

[作者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译者张宪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郭阳)

从战争到战后:史学与中国抗日战争遗产之评价

米 德(Rana Mitter)

在西方有关二战的分析中,中国的作用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尽管相对而言,中国仍旧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战区,但是,在更广范围的全球性冲突的历史研究中,中国的重要性正变得日益清晰起来。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迈向一个新阶段,亦即要进一步推动抗战研究向前发展的阶段,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关键任务似乎在于将战后时期也纳入重新评价的范围中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国民(国民党)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被迅速击垮。然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战后初期存在过一个可以利用其在抗日斗争中赢得的政治声望的短暂机会。尽管国民政府在短短四年后便土崩瓦解,但是,至少它在国际层面取得的一些成就在大陆留下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最显著的成就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国民党中国还成为了另